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尝试

张西平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研究丛书”是我2007年所申请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研究课题攻关项目的成果。

这套丛书的基本设计是：导论1卷，编年10卷，文学、文化传播研究6卷，中国古代文化域外传播专题研究6卷，整个项目23卷。

各卷的主编和具体卷目如下：

导论部分：

张西平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导论：以西方为中心》

编年系列：

顾钧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美国的传播编年》

柳若梅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俄罗斯的传播编年》

李雪涛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德国的传播编年》

李真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英国的传播编年》

丁超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北欧的传播编年》

[法]安必诺(Angel PINO) [法]何碧玉(Isabelle RABUT)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法国的传播编年》

王苏娜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意大利的传播编年》

严绍盪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日本的传播编年》

苗春梅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韩国的传播编年》

苏莹莹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东南亚的传播编年》

文学文化系列：

葛桂录主编：《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

佟加蒙、李亚兰著：《中国文化在南亚》

薛庆国著：《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

李丽秋著：《20世纪韩国对韩国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接受情况的研究》

赵苗著：《日本明治时期刊行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白淳主编：《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研究》

专题研究系列：

张西平、孙健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以20世纪为中心》

葛桂录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利、霍克思》

潘琳著：《比较、争论与诠释——理雅各牛津时代思想研究》

姚军玲著：《红楼梦 在德国的传播与翻译》

莫丽芸著：《英美汉学中的白居易研究》

马少甫著：《中国文化在美国早期的传播：以裨治文、卫三畏为中心》

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本课题是中外学术界首次系统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这样一种研究视域，突破以往仅仅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局限于中国本土的研究方法，而是将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世界主要国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和影响，以此说明了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我在本课题申请时，曾在申请表上写下如下的论述：

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和影响，可以使走出“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思维，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考察中国文化的价值，以一种全球视角来重新审视我们古代文化的影响和现代价值，揭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这样

的研究对于消除当前中国学术文化界所存在的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焦虑和彷徨，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中国重新确立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树立文化自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文化意义。

通过了解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世界各国的中国观，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如何经过“变异”，融合到世界各国的文化之中。通过对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和影响的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文化向外部世界传播的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方法，为国家制定全球文化战略做好前期的学术准备，为国家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宏观政策的制定提供学术支持。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域外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学术事业。本课题的设立将打破这样的分隔与疏离，以形成双方的学术互动。对中国学术本身来说，课题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国内学术界了解域外汉学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进展，以他山之石攻玉。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汲取域外汉学界在20世纪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研究的成果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观念上认识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学术界本身，而应以更加开阔的学术视野展开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研究与探索。

这样一个想法，在我们的23卷研究中基本实现了，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展开研究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研究绝非我们这样一个课题就可以完成的，这是一个崭新的学术方向和领域，需要学术界长期关注与研究。基于这样的考虑，在课题设计的布局上我们的原则是：立足基础，面向未来，着眼长远。我们希望，使本课题的研究为今后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总论一卷，写作以导论为原则，初步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西方传播的轨迹，并从理论和文献两个角度对这个研究领域的方法论做了初步的探讨。在编年系列部分，从文献目录入手，系统整理出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经典

在世界主要国家的传播编年。编年体是中国传统记史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这样大规模地做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的编年研究，专题研究和文化研究这是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主题的深化。

为完成这个课题，三十余位国内外学者奋斗了7年，到出版时几乎是用了十年时间。即便这样，这个研究仍是刚刚开始，待继续努力的地方还很多。如这里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主要侧重于以汉文化为主体展开的，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长期发展中，少数民族的古代文化经典已经逐步融合到以汉文化这个文化主干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充满活力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原因之一。但由于时间和知识上多方面限制，在本丛书中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经典在外部传播尚未全面展开，只是在个别卷目中有所涉猎。在语言和国别的广度上也有待扩展，例如，在编年系列中待今后继续展开的语种还很多，如在欧洲语言中尚未把西班牙语、瑞典语、荷兰语、北欧语言等包括进去，在亚洲语言中印地语、孟加拉语、僧伽罗语、乌尔多语，波斯、中亚几国的传播编年也未做。因此，我们只是迈开了第一步，我们希望在今后几年继续完成以上缺失的国家语言的编年工作，希望在第二版时，我们能将编年卷做得更好，使其成为学术界使用最为方便的工具书。

中国文化是一种全球性文化，它的影响不仅在东亚文化圈和欧美文化圈，同样，在东南亚、南亚以及阿拉伯世界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此，本丛书尽力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多种文化区域传播的图景展现出来。或许这些研究仍待深化，但这样一个图景，会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

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传播的研究近年来逐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初步统计目前出版的相关专著已经有十几本之多，相关博士论文已经有几十篇，关于这类课题，无论是国家的还是教育部的都有了近十余个。随着“一带一路”国家重大战略的展开，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开始更为聚焦这个方向。应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进步很大，成果显著。但由于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崭新研究领域，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例如，

应该如何更为深入地展开这一领域的研究呢？从知识和学科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这个研究领域呢？用什么样的方法展开这个领域的研究呢？这样一个研究在学术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对这些问题笔者在这里做一初步的探讨。

一、历史：展开中国典籍外译研究的基础

根据目前研究的进展，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第一次翻译成欧洲语言是在 1592 年，由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高母羨（Juan Cobo, 1546—1592）⁽¹⁾ 第一次将元末明初的中国文人范立本所编著的一本关于中国文化先贤格言的蒙学教材《明心宝鉴》翻译成西班牙文。《明心宝鉴》收录了孔子、孟子、庄子、老子、朱熹等先哲的格言，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出版。这样算起来欧洲人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已经有了 420 年的历史。如果展开这样的研究，对研究者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熟知西方汉学的历史。

因为，仅仅拿着一个译本，做单独的文本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译本是谁翻译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哪个时期的汉学家？他翻译时的中国助手是谁？他所用的中文底本是哪个时代的刻本？这些都涉及对汉学史的了解。例如，如果研究《明心宝鉴》的西班牙译本就要知道高母羨的身份，他是道明会的传教士，他翻译的这本书是她在菲律宾完成的，当时作为在菲律宾的道明会传教士学习汉语所用。他为何选择了《明心宝鉴》而不是别的儒家经典呢？因为，这个本子是他从当时在菲律宾的中国渔民那里得到的，这些中国的侨民也

都是粗通文墨的人，不可能带有很好的儒家本子，而《菜根谭》和《明心宝鉴》是晚明时期流传最为广泛的儒家伦理格言书籍。由于这是一个以闽南话为基础的西班牙译本，书中如书名、人名及部分难以意译的地方，取音译方式，其所注字音，当然也是闽南语音。这样我们对这个本子的研究就必须熟悉和懂得闽南语。同时，由于译者是天主教传教士身份，这就要求我们应该对欧洲天主教的历史发展和天主教神学思想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才能进入其文本的翻译研究之中。

又如法国第一位专业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医研究的，《论中医舌苔诊病》（“Dissertat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e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 Th. de Paris, 1813）论文中翻译了中医的一些基本文献，这是中医传向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如果做雷慕沙的这篇文献的研究，就必须熟悉西方汉学史，因为雷慕沙并未来过中国，他关于中国中医的知识从哪里来的呢？他是从波兰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rn, 1612—1659）那里来的，卜弥格 1656 年在维也纳出版了《中国植物志》。

这是西方研究中国动植物的第一部科学著作，还保存了原著中介绍的每一种动植物的中文名称和卜弥格为它们绘制的二十七幅图像。后来因为这部著作受到欧洲读者极大的欢迎，在 1664 年，又发表了它的法文译本，名为《耶稣会士卜弥格神父写的一篇论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花、水果、植物和个别动物的论文》。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首席大

(1) “高母羨系西班牙多來都省（Toledo）舒厄各拉人（Consuegra），死于一五九二年十一月。高母羨于一五六三年加入道明会（Order of Preachers），……！在赫纳斯的阿卡拉大学接受神哲学训练，然后从事神哲学的教学工作。高母羨于一五八六年加入由三十九位道明会士组成，志愿远赴远东的菲律宾传播基督宗教的传教团体行列，这一团体怀着打开亚洲大陆传教之门的梦想和远见来到了菲律宾，在途经墨西哥时，高母羨在该地一年以达成一项重要使命，然而他的同伴们已先赶往菲律宾，他们一行数十人在一五八七年七月抵达菲律宾。”摘自潘贝新《高母羨和玫瑰省道明会传教方法研讨》。“‘Juan Cobo’，是他在 1590 年寄给危地马拉会友信末的落款签名，也是同时代的欧洲作家对他的称呼；‘高母羨’，是 1593 年马尼拉出版的中文著作《辩正教真传实录》一书扉页上的作者；‘羨高茂’，是 1592 年他在翻译菲律宾总督致丰臣秀吉的回信中使用的署名”。摘自蒋薇硕士论文《高母羨（Fr. Juan Cobo）出使日本再议》抽样本；参阅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 年，第 83—89 页。这里所说的典籍外译，指的是整本典籍的外译历史，如果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一般性介绍和段落翻译则有更长的历史。

夫阿德列亚斯·克莱耶尔 (Andreas Clayer) 1682年在德国出版的一部《中医指南》中, 便将他所得到的卜弥格的《中医处方大全》《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一篇论脉的文章》和《医学的钥匙》的部分章节, 以他的名义发表了。⁽¹⁾

这就是雷慕沙基本材料来源。如果对卜弥格没有研究, 那就无法展开对雷慕沙的研究, 更谈不上对中医西传的研究和翻译时的历史性把握。

这说明研究者要熟悉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的沿革历史, 只有如此才能展开研究。西方汉学如果从游记汉学算起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如果从传教士汉学算起已经有四百年历史, 如果从专业汉学算起也有近二百年的历史。在西方东方学的历史中汉学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历史并不长, 但这个学术的传统和人脉一直在延续着。正像我们中国做学术研究必须熟悉学术史一样, 做中国文化典籍在域外的传播首先就要熟悉域外各国的汉学史。因为, 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由汉学家们来完成的。不熟悉汉学家的师承、流派和学术背景, 自然就做不好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上面这两个例子还说明从西方汉学来说, 它作为学科门类是在西方的东方学之中的, 但它的发生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产生的。这样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仅要熟悉西方汉学史, 也要熟悉中西文化交流史。例如, 如果你不熟悉元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那就根本无法读懂《马可波罗游记》; 如果你不熟悉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你也根本无法了解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汉学家的汉学著作, 甚至你完全如堕烟海, 根本不知从何下手。如上面讲的卜弥格是中医西传第一人, 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西传上贡献很大, 但他同时是南明王朝派往梵蒂冈教廷的中国特使, 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如果对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不熟悉, 那你就无法进入

这个研究领域。就是一些没有来过中国的当代汉学家, 在其展开中国典籍的翻译中也会和中国的实际历史与人物发生关系与联系, 并对其翻译产生影响。例如 20 世纪西方汉学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最重要的翻译家阿瑟·韦利 (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 和中国作家萧乾的联系以及和胡适的关系, 这些都对他的翻译产生过影响。

历史是展开一切人文学科的基础, 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尤其如此。

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有关典籍翻译的研究起源于清末民初之际。辜鸿铭对西方汉学家的典籍翻译多有微言, 那时的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界已经不是很陌生, 不仅不陌生, 实际上晚清西学对中国学问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在西学之中的汉学。⁽²⁾ 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学界互动的结果, 我们只要提一下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葛兰言 (Marcel Granet, 1884—1940) 在民国时的影响就可以知道。⁽³⁾ 但中国学术界自觉地将西方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对象加以研究和分梳的历史并不长, 大都是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对西方汉学发表评论, 对于西方汉学的学术历史研究甚少。莫东言的《汉学发达史》到 1936 年才出版, 实际上这本书绝大多数知识来源于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⁴⁾。近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汉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 个案研究、专书和专人研究以及国别史研究都有了重大的进展。像徐光华先生的《国外汉学史》, 阎纯德先生主编的《列国汉学史》等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初步的线索, 但应看到, 对国别汉学史的研究也是刚刚开始, 每一个从事中国典籍外译的学者都应注意对汉学史的梳理和研究。但我们应承认至今令学术界满意的关于中国典籍外译史的专著并不多见, 即便是国别的中国

(1) 张振辉:《卜弥格与明清之际中学的西传》,《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183—202页。

(2) 参阅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7—114页。

(3) 参阅《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李孝迁:《葛兰言在民国学术界的反响》,《华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月。

(4) 石田干之助著,朱滋萃译:《欧人之汉学研究》,北平中法大学,1934年。

典籍外译的专题历史研究著作都尚未出现。⁽¹⁾ 因为, 这涉及太多的语言和国家, 绝非短期内可以完成。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 了解沿路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历史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一旦我们翻阅学术史文献, 就会感到, 在这个领域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 尤其对沿路发展中国家文化与中国文化互动的了解。百年以西为师, 我们似乎忘记了家园和邻居, 悲矣! 学术的发展总是一步步向前的, 愿我们沿着季羨林先生开辟的中国东方学之路, 由历史而入, 拓展中国学术发展的新空间。

二、文献：西方汉学文献学亟待建立

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开卷就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告初学。”学问由目入，读书自识字始，这是做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方法。这样的方法，在我看来也同样适用于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这对于我们展开中国典籍外译的研究十分重要。因为，在19世纪前中国典籍的翻译以传教士为主，传教士的这些中国典籍的译本在欧洲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17世纪时传教士的一些译本是拉丁文本的，例如柏应理和一些耶稣会士联合翻译的《中国哲学家孔子》，这里包括了《论语》《大学》《中庸》，这本书的影响很大，很快就有了各种欧洲语言的译本，有些是节译，有些是改译，如果我们没有西方汉学文献学的知识，一定会搞不清这些译本之间的关系。

18世纪时欧洲的流行语言是法语，会法语是上流社会的标志。恰好此时来华的传教士由意大利籍已经转变为法国耶稣会士为主。这些法国来华的传教士学问基础好，对中国典籍翻译极为勤奋。法国传教士的汉学著作中包含了大量的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介绍和翻译，例如来华耶稣会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返回法国

后所写的《中国近事报道》（*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1696年在巴黎出版，他在书中介绍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典籍《五经》，同时介绍了孔子的生平，李明所介绍的孔子的生平在当时欧洲出版的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著作中最为详细。这本书出版后四年内竟然重版五次，并开始有多种译本。如果我们对法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不了解，就很难做好翻译研究。

19世纪后英语逐步取得霸主地位，英文版的中国典籍著作逐渐增加，版本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复杂。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在翻译《论语》时，既看早年由英国汉学家柯大伟（David Collie）翻译的第一本英文版《四书》⁽²⁾，也参考理雅各的译本，如果只是从理雅各的译本来研究庞德的翻译肯定不全面。

20世纪后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一直在继续，翻译的范围在扩大，学者研究百年的《论语》翻译就有相当数量的译本，而《道德经》的译本更是不计其数，有的学者说世界上有两个被翻译最多的文化经典文本，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道德经》。这说明在我们从事文明互鉴与互动时，尤其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翻译和传播研究时，一定要从文献学入手，从目录学入手，这样才会保证我们在翻译研究上对版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清楚地了解，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中国学术传统中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在我们致力于域外汉学研究时同样需要的。

目前，国家目前的对汉籍外译投入了大量的费用，国内学术界也有相当一批学者在从事这样事业。但我们在开始这项工作时应该摸清世界各国已经做了哪些工作，哪些译本是受到欢迎的，哪些译本问题较大，哪些译本是节译，那些译本是全译。只有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能确定新的翻译政策。显然，由于目前我们在域外汉学的

(1)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这本书尽管是汉籍外译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但书中的错误颇多，注释方式也不规范，究竟是一手资料还是二手资料，在书中完全分不清。关键在于作者对域外汉学史并未有深入地了解，仅仅在二手文献基础上展开的研究是不可靠的。学术界对这本书也提出了批评，参阅许东平：《汉籍外译史 还是 汉籍歪译史》，光明网，2011年8月21日。

(2) The Latb Rev. David Collie, *The Four Books*, Printed at Mission Press, 1828.

文献学上做得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情况若明若暗。这样，国内现在确立的一些翻译计划是重复的，在学术上是一种浪费。即便国内学术进行重译，也需要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展开。这点我们做得不理想。

就西方汉学而言，西方汉学的基础性书目最重要的是两本目录，一本是法国汉学家考狄所编写的《汉学书目》(*Biblioteca sinica*)，一本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奠基人之一袁同礼于1958年出版的《西文汉学书目》(*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¹⁾

四卷本的考狄书目收集了从西方最早对中国的记载到1921年期间，他能收集到在西方出版的关于研究中国的书籍都收集在其中了，自然包括了大量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译本的目录。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则是“接着说”，他在书名中就表明是接着考狄来做的。他编制了从1921年到1954年期间的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研究的书目，自然也包括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书目。袁同礼之后西方再没有编出一本统一的类似的书目，一方面是中国研究的进展速度太快，另一方面，中国研究的范围在快速地扩大，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的思路下已经很难把握这快速发展的中国研究。

当然，国外学者在近五十年来也还是编制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专科性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特别是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翻译也有了专题性书目，例如，美国学者所编写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与欣赏论文书目指南》，⁽²⁾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专

题性书目，对于展开中国古典文学在西方的研究奠基了基础。日本学者所编的《东洋学文献类目》是当代较有权威的中国研究书目，也涵盖了部分亚洲研究的文献目录，但语言涵盖数量也有限。当然中国学术界也同样有着较大的进步，台湾学者王尔敏编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无疑是中文学术界较早的西方汉学书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汪次昕编《英译中文诗词曲索引：五代至清末》，⁽³⁾王丽娜的《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⁴⁾是新时期第一本从目录文献学上研究西方汉学的著作。林舒俐和郭英德所编辑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英文论著目录》，⁽⁵⁾顾钧、杨慧玲在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基础上所编制的《中国丛报目录》，⁽⁶⁾王国强在其《中国评论(1872—1901)与西方汉学》中所附的《中国评论》目录和《中国评论》文章分类索引都是我们进行研究域外汉学和中国古代文化外译的最新进展。

从学术的角度看，无论是海外汉学界还是中国学术界在汉学的文献学和目录学上都仍有待继续展开基础性的研究和学术建设的极大空间。例如，在17—18世纪“礼仪之争”后来华传教士所写的关于在中国传教的未刊文献的数量至今没有基础性书目，这里只要指出傅圣泽和白晋的有关文献数量就足以说明问题。⁽⁷⁾在罗马传信部档案馆、梵蒂冈档案馆、耶稣会档案馆有着大量未刊的耶稣会士关于“礼仪之争”的文献，这些文献都涉及对中国典籍的翻译问题。在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方济各传教会也有大量的“礼仪之争”期间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未刊文献。这些文献

(1) 书名翻译为《西方文学作品里的中国书目——续考迪之汉学书目》更为准确，《西文汉学书目》更简洁些。

(2) Winston Li Y. Yang Peter Li and Nathank. Mao, *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 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 Essay and Bibliographies*, 1978, USA.

(3) 汪次昕编：《英译中文诗词曲索引：五代至清末》，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编印，2000年。

(4) 王丽娜：《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年。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期间曾多次得到王先生的帮助与鼓励，在此表示感谢。

(5) 林舒俐、郭英德编：《中国古典戏剧研究英文论著目录》(上下)，《中国戏剧研究》，2009年第3期。

(6) 在未充分了解国外汉学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基本情况下，很难对外译中和中译外之间的关系作出准确的判断。

(7) 参阅魏若望著，吴莉苇译：《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丹麦)龙伯格著，李真、骆洁译：《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柯兰霓著，李岩译：《白晋生平与著作》，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目录未整理出来以前，我们仍很难写出中国古代文献西文翻译史。

由于中国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学术事业，无论是美国亚洲学会的中国学研究网站所编的目录，还是日本学者所编的目录，都已经不能满足我们学术发展的需要。我希望知道伊朗的中国历史研究，希望了解孟加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没有目录提供这一切。此时，想起袁同礼先生当年主持北平图书馆工作时曾说过，中国国家图书馆应成为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文献的中心，编制世界的汉学研究书目应是我们的责任，先生离开大陆后，晚年一人每天站立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目录架旁，抄录海外中国学研究目录。终于继考狄之后完成了《西文汉学书目》，开启中国学者对域外中国研究文献学研究之先河。今日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同仁和中国文献学的同行们能否继承前辈之遗产，为飞出国门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时期的文献学的阶梯呢？我们期待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七年前我在承担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域外的传播》，决心接续袁先生的工作做一点尝试，我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学术界的同事们以七年之力，编制了十卷本的中国文化传播编年，这十卷涵盖了21种语言，涉及三十余个国家。据我孤陋寡闻，这或许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次涉及如此多语言的中国文化外传文献编年。

尽管这些编年略显幼稚，多有不足，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学者们第一次把自己的语言能力与中国学术的基础性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总算在袁同礼先生的事业上前进了一步。他老人在天之灵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露出笑容。

学术界对于加强海外汉学文献学研究的呼声也很高，李学勤先生当年主编出版的《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就是希望从基础文献入手加强对西方汉学名著的了解。程章灿更是提出一个十分具体的方案，认为如果把欧美汉学作为学术资源，应该编制“第一，从学术文献整理的角度，分学科、系统编纂中外文对照的专业论著索引。就欧美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而言，这一工作显得相当迫切。这些论著至少应该包括汉学专著、汉籍外译本及

其附论（尤其是其前言、后记）各种教材（包括文学史与作品选）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几大项。其中，汉籍外译本与学位论文这两项比较容易被人忽略。这些论著中提出或涉及的学术问题林林总总，如果没有广为中国学术界所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批判或吸收。第二，从学术史角度清理学术积累，编纂重要论著的书目提要。从汉学史上已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中，选取有价值的、有影响的，特别是有学术史意义的著作，每种写一篇两三千字的书目提要，述其内容大要、方法特点，并对其作学术史之源流梳理。对这些海外汉学文献的整理，就是学术史的建设，其道理与第一点是一样的。第三，从学术术语与话语沟通的角度，编纂一册中英文术语对照词典。就中国文学研究而言，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英语与汉语是两种最重要的工作语言。但是，对于同一个中国文学专有名词，往往有多种不同的英语表达法，国内学界英译中国文学学术术语时，词不达意、生拉硬扯的现象时或可见，极不利于中外学者的沟通和中外学术的交流。如有一册较好的中英文中国文学学术术语词典，不仅对于中国研究者，而且对于学习中国文学的外国人，都有很大的实用价值。第四，在系统清理研判的基础上，编写一部国际汉学史略。”^①

历史期待着我们这一代，从基础做起，从文献做起，构建起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大厦。

三、语言：中译外翻译理论有待探索

翻译研究是做中国古代文化向外传播研究的重要环节，没有这个环节，整个研究就不能建筑在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在中译外的翻译研究中如何创造出中译外的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在翻译理论、翻译的指导观念上不发生变革，一味追求西方的翻译理论，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套用在“中译外”的实践中，那样，中国典籍的外译将不会有更大的发展。

“外译中”和“中译外”是两种翻译实践活动：一种是将外部文化译入本土文化之中，我们称之为“译入”。另一种是将本土文化移入外部文化之中，我们称为“译出”。几乎每一种大的有影

① 程章灿：《作为学术文献资源的欧美汉学研究》，《文学遗产》2012年第2期，第133—135页。

响的文化都会面临这两方面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 这就是“外译中”和“中译外”的问题, 是文化的接受与文化的输出问题。前者说的是将外部世界的文化经典翻译成中文, 后者说的是将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翻译成外文。

中国文化史告诉我们, 我们有着悠久的“外译中”的历史, 例如从汉代以来的中国对佛经的翻译和近百来中国对西学和日本学术文化的翻译。对中国典籍的外译最早可以起源于玄奘译老子, 但真正开始是起源于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 上面所讲的高母羨、利玛窦等人。中国人独立开始这项工作则是从晚清的陈季同和辜鸿铭开始。“外译中”和“中译外”作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自然有这共同性, 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 目的语和源语言在“外译中”和“中译外”中都发生了根本性的置换, 这种翻译实践中的目的语和源语言的不同对译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因此, 将“中译外”作为一个独立的翻译实践来展开研究是必要的, 正如刘宓庆所说: “实际上东方学术著作的外译如何解决文化问题还是一块丰腴的亟待开发的处女地。”⁽¹⁾

由于在翻译目的、译本选择、语言转换上的不同, 在研究“中译外”时完全照搬西方的翻译理论是有问题的。当然, 并不是说西方当代的翻译理论不可用, 而是这些理论的创造者的翻译实践大都是建立在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实践上的, 在此基础上的翻译理论面对东方文化时, 特别是面对汉字为基础的汉字文化时会产生一些问题。潘文国认为, 至今为止, 西方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在印欧系语言内翻译实践的总结和提升, 那套理论是“西西互译”的结果, 用到“中西互译”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在“西西互译”中基本上是在“均质印欧语”中发生的, 而“中西互译”则是在遥远距离的语言之间的翻译, 这样他认为“只有把‘西西互译’与‘中西互译’看作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翻译, 因而需要不同的理论, 才能以更为主动的态度来致力于中国译论的创造。”⁽²⁾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具有本体论的作用, 而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达。刘勰在《文心雕

龙·原道》中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 方圆体分, 日月叠璧, 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 以铺地理之形; 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 俯察含章, 高卑定位, 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 性灵所钟, 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 实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 动植皆文; 龙凤以藻绘呈瑞, 虎豹以炳蔚凝姿; 云霞雕色, 有逾画工之妙; 草木贲华, 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 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 调如芋瑟; 泉石激韵, 和若球铎; 故形立则章成矣, 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 郁然有采, 有心之器, 其无文欤!

刘勰这段对语言和文字功能的论述绝不亚于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性质的论述, 这里他强调“文”的本体意义和内涵。他认为, 文的本体意义表现在: 天文、地文、人文这三文为“五行之秀, 实天地之心,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

中西两种语言, 预示着两种思维, 两种逻辑。“外译中”是一个如何将抽象概念具象化的过程, 如何将逻辑性思维转换成伦理性思维的过程。“中译外”是一个如何将具象思维的概念抽象化的过程, 如何将伦理性思维转换成逻辑性思维的过程。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和他的合作者也是这样的思路, 在中国典籍的翻译上反对用一般的西方哲学思想概念来表达中国的思想概念, 因此, 他在翻译中国典籍时着力于揭示出中国思想异于西方的特质。

“语言是世界的边界”, 两种思维方式特点、两种语言特点决定了在“外译中”和“中译外”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由此, 在翻译上就要注意这两种不同方向的翻译所形成的各自的特点。基于语言和哲学思维的不同所形成的“中译外”和“外译中”是两种不同的翻译实践, 我们应该重视对“中译外”理论的总结, 现在流行的用“西西互译”的翻译理论来解释“中西互译”是有问题的, 来解释“中译外”更是一个问题。这对中国翻译界来说应是一个新的课题, 因为, 在“中西

(1)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年, 第272页。

(2) 潘文国《中籍外译, 此其时也: 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6期。

互译”中，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主要是“外译中”，中国学术界的翻译实践并未留下多少“中译外”的经验，尽管我们也有辜鸿铭、林语堂、陈季同、吴经熊、杨宪益、许渊冲等前辈的可贵实践。所以，认真总结这些前辈的翻译实践，提炼“中译外”的理论是一个亟待努力的工作，同时，在对比语言学和对比哲学的研究上也应着力，以为“中译外”的翻译理论打下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许渊冲先生的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探索尤其值得我国学术界的关注。许渊冲先生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奇迹，他在“中译外”和“外译中”两条战线同时展开，这本身就十分罕见，同时，在中国典籍外译中，他同时在英文和法文两个语种同时展开，这更是无人可比。“书销中外五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的确是他真实的写照。从陈季同、辜鸿铭、林语堂中国学者在“中译外”上不断实践，到许渊冲先生为止达到一个高峰。他不仅在“中译外”的翻译数量上在中国学者中居于领先地位，尤其在古典诗词的翻译上，成就卓著，即便是和西方汉学，例如英国汉学家韦利相比也毫不逊色。更重要的在于他的翻译质量也得到了西方读者的认可，他的译著先后被英美出版社出版，这是目前中国学者“中译外”作品直接进入西方阅读市场最多的一位译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渊冲从中国文化本身出发所总结的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这套理论目前是中国翻译界较为系统的、自成体系，并获得翻译实践支撑的翻译理论。面对翻译界铺天盖地的西方翻译理论的涌入，许渊冲坚持走自己的路，坚持从中国翻译的实践出发，面对指责和批评，他不为所动。他这种坚持文化本位的精神、这种坚持从实践出发探讨理论的风格，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他把自己的翻译理论概括为：

“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实际上，这十个字是拆分开来解释的。“美”是许渊冲翻译理论的“三美”论，诗歌翻译应做到译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这是许渊冲诗歌翻译的本体论；“化”是翻译诗歌时，可

以采用“等化、浅化、深化”的具体方法，这是许氏诗歌翻译的方法论；“之”是许氏诗歌翻译的意图或最终想要达成的结果，使读者对译文能够“知之、乐之并好之”，这是许氏译论的目的论；“艺术”是认识论，许渊冲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诗词翻译是一种艺术，是一种研究“美”的艺术。“创”是许渊冲的“创造论”，译文是译者在原诗规定范围内对原诗的再创造；“优”指的是翻译的“信达优”标准和许氏译论的“三势”优势、劣势和均势说，在诗歌翻译中应发挥译语优势，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来翻译；“似”是“神似”说，许渊冲认为忠实并不等于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竞赛”指文学翻译是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与两种文化的竞赛。^①

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不去套用当下时髦的西方翻译词语，而是从中国文化本身汲取智慧，并努力使理论的表述通俗易懂、汉语化和民族化。例如他的“三美”之说来源于鲁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

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嶙峋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丰木，鱗魴鳣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其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他的“三知”理论，即在翻译中要做到“知之·好之·乐之”，这是来自孔子《论语·雍也篇》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而他套用道德经的语言所总结的翻译理论，在语言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理论上也完备而简洁，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者对翻译理论的最精彩总结。

译可译，非常译。
忘其形，得其意。
得意，理解之始；
忘形，表达之母。
故应得意，以求其同；

(1) 张进：《许渊冲唐诗英译研究》，硕士论文抽样本，第19页，参阅张智中：《许渊冲与翻译艺术》，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故可忘形, 以存其异。
两者同出, 异名同理。
得意忘形, 求同存异;
翻译之道。

2014年在第二十二届世界翻译大会上, 由中国翻译学会推荐, 许先生获得了国际译学界的最高奖项“2014 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 这是该奖项 1999 年设立以来, 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为我们奠基了新时期“中译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坚实学术基础, 这个事业有待后学不断丰富。

四、知识：跨学科知识的修养是对研究者的基本要求

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海外的翻译与传播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 语言能力只是进入这个研究门槛的一张门票, 但能否坐在演出的前排, 能否登台演出那将是另一回事。因为, 很显然, 语言能力尽管很重要, 但它只是展开这个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条件, 不是全部条件。

研究者首先应该具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与修养, 因为, 我们面对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海外汉学界, 汉学家们所翻译中国典籍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除了我们熟知的儒家经典, 经、史、子、集外, 有许多关于中国的专业知识, 也是他们翻译的对象。例如俄罗斯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对宋代历史文学极其关注, 翻译了大量的宋代文学作品, 数量之大令人吃惊, 你如果研究他, 仅仅是俄语系毕业是不行的, 研究者必须同时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 是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清中前期, 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已经将中国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翻译成法文, 至今尚未一个中国学者研究这个译本, 因为这要求译者不仅仅是懂宋代的历史, 还要具备中国古代法医学知识。

中国典籍的外译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产生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之中, 如果对中西文化交流史这个学科的知识欠缺, 常识性的错误就会出现, 研究 18 世纪的中国典籍外译要熟悉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研究 19 世纪的中国典籍外译就要熟悉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东亚之间文学交流, 就要懂中日、中韩文化交流史。

同时, 由于译者是国外学术背景, 如果展开

对译者和文本的研究就必须熟悉译者国家的历史与文化, 学术与传承。知识的扩展是必须的。

目前, 绝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化外译的研究者是外语背景出身的学者, 这些学者的语言能力使他们成为这个领域的主力军, 但显然, 由于目前教育严重的分科教育, 在全国外语类大学缺乏系统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训练, 这样在目前的研究中尚不能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有些译本作为国内外外语系的阅读材料尚可, 要拿到对象国出版还有很远的距离, 因为这些译本大都无视对象国汉学界译本的存在。的确, 研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 是一个青年学者成长的天堂, 但同时, 这也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 这个领域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挑战, 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因此, 走出单一学科的知识结构, 特别是要更为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使自己成为中国历史文化领域的研究者,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将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海外传播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研究更深入地展开。这说明, 研究者必须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与文献十分熟悉, 由此才能展开研究。当然术业有专攻, 任何人在当下的知识分工下已经不可能具备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但掌握其中的一部分, 领会其精神是重要的。就此而言, 这对中国外语大学的教学体系改革提出了挑战和要求, 中国历史文化课程必须进入外语大学的必修课中, 否则未来的学子们很难承担这一历史性的重任。

五、方法：跨文化的比较文化视角是其基本的方法

从本质上讲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与发展研究是一种文化间关系的研究, 是在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别的背景下展开的, 这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国学研究是有区别的。这点严绍盪先生有过十分清楚的论述, 他说:

国际中国学(汉学)就其学术研究的客体对象而言, 是指中国的人文学术, 诸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考古等等, 实际上, 这一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中国人文学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 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 都可

以归入中国的人文学术之中。但是作为从事于这样的学术的研究者，却又是生活在与中国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包括价值观念、人文意识、美学理念、道德伦理和意识形态等等，和我们中国本土很不相同。他们是从他们的文化为背景而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通过这些研究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从根本上说，是他们“母体文化”观念。所以，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国际中国学（汉学）的学术成果，其实也是他们“母体文化”研究的一种。从这样的视角来考察国际中国学（汉学），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具有“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¹⁾

严先生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外译和传播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些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翻译中的误读太多，由此，中国文化的经典只能由中国人来翻译，这才是一种忠实的中国文化典籍翻译，而不是像西方传教士汉学家那样的误读式的翻译。显然，这样的看法缺乏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的视角，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典籍外译时，如果没有这个视角许多问题是说不清的。

“误读”是翻译中的常态，无论是“外译中”，还是“中译外”，这里除了由于文化之间的转换所造成的知识上的不足产生的误读外，⁽²⁾文化理解上的误读更是比比皆是。甚至是故意的误译，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中国典籍，最明显的就是美国诗人庞德。1937年他只带有理雅各的译本，没有带词典，由于理雅各的译本本身就有中文原文，他就自己瞪眼看书中的汉字，从中理解《论语》，并自称这是“注视字本身”方法，瞪眼看汉字三遍就有了新意，开始翻译。例如《论语·公冶长第五》，“子曰：道不行，乘桴桴于海。从我

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朱熹注：“不能裁度事理。”理雅各按照朱注释，庞德不同意，因为他从‘材’字中看到‘一棵树加半棵树’马上想到孔子需要一个‘桴’。于是庞德译成‘Yu like danger better than I do, But he wouldn't bother about getting the logs’（由比我喜欢危险，但他不屑去取树木。）庞德还指责理雅各译文‘失去林肯式的幽默’。后来他甚至把理雅各译本称为‘丢脸’（an infamy）⁽³⁾庞德的这种译文完全是为自己所用，谈不上忠实，但庞德的译文却在美国和西方产生了影响。日本比较文学大家大家幸男说：“翻译文学，在对接受国文学的影响中，误解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有时拙劣的译文，意外地产生极大的影响。”⁽⁴⁾庞德就是这样的翻译家，他翻译了《论语》《中庸》《孟子》《诗经》等中国典籍，但他一个汉字不认识，完全借助理雅各的译本，但他又不依靠理雅各的译本，而是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的想法来翻译，他把《中庸》翻译为“不动摇的枢纽”（Unwobbling Pivot），将“君子而时中”翻译成“君子的轴不摇动”（The master man's axis does not wobble），这里的关键在于他认为“中”是“一个动作的过程，一个某物围绕旋转的轴”。只有有了比较文学和跨文化理论的视角，我们才能理解庞德这样的翻译。

在比较文学看来，文学的译本一旦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它就成为各国文学历史的一部分，“在翻译中，创造性的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⁵⁾这种叛逆就是在翻译时对原语言文本的改写，任何译本只有在符合本国文化时，译本才会“获得了第二生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谢天振先生主张将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它不再隶属于外国文学，这些译本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一部分，为此，他专门写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⁶⁾这个观点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被翻译成西方语言的中国古代文化典

(1) 严绍盪：《我对国际中国学（汉学）的认识》，《国际汉学》第5期，郑州：大象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2) 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在翻译陶渊明的《责子》时将“阿舒已二八”翻译成“A-Shu is eighteen”，显然是他不知在中文中“二八”是指16岁，而不是18岁。这样知识性的翻译错误是常有的。

(3) 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

(4) 大家幸男：《比较文学原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1页。

(5) 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6) 谢天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籍的新视角。

尽管中国学者也可以在中国典籍的翻译上做出成就，例如，林语堂先生、许渊冲先生，但这毕竟不是主流。目前国内的许多译本并未在域外产生真正的影响。对此王宏印先生指出：

毋庸置疑，虽然我们取得的成就很大，但国内的翻译、出版的组织质量良莠不齐，加之推广和运作方面的困难，使得外文形式的中国典籍的出版发行多限于国内，难以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教学研究领域。有些译作甚至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口转内销”产品，只供学外语的学生学习外语和翻译技巧，或者作为某些懂外语的人士的业余消遣。在现有译作精品的评价研究方面，由于信息来源的局限和读者反应调查的费钱费力时，大大限制了这一方面的实证性研究和有根有据的评论。一个突出的困难就是很难得知外国读者对于中国典籍及其译本的阅读经验和评价情况，以致于影响了研究和评论的视野和效果，有些译作难免变为译者和学界自作评价和自我欣赏的对象。⁽¹⁾

应该说，王宏印先生的这段话揭示了目前国内学术界中国典籍外译的现状。目前中国政府各类部门主导的中国文化、中国当代学术外译工程大都建立在以中国学者来完成的基本思路上。但这样的思路在对待中国文化外译工作时有两个基本的误区：第一，忘记了一个基本的语言学规律：外语再好，也好不过母语，翻译时没有对象国汉学家的合作在知识和语言上都会有不少问题。应该认识到林语堂、杨宪益、许渊冲毕竟是少数，中国学者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文化外译的主力。第二，这些项目的设计主要面向西方国家，但今天崛起的中国，国家利益遍及全球，“一带一路”涉及六十余个国家，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非通用语是主要语言形态，⁽²⁾此时，如果完全依靠中国非通用语界的学者们是很难完成的，⁽³⁾此刻，方感到团结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之重要与迫切。

莫言获奖后国人无不欢喜，有关部门也开启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翻译工程，这个工程有一个重要的进步就是面向海外汉学家招标，而不是寄希望于中国外语专业的学者来完成。小说的翻译和中国典籍文化的翻译有着重要的区别，它更多体现了跨文化研究的特点。

以上五点都是从研究的方法论上来讲的，应该看到中国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和海外汉学所展开的研究标示着中国学术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这样一种学术形态，揭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我们从事中国文化学术研究时，我们已经不能无视这些域外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必须与其对话，或者赞同，或者批评，域外汉学已经成为中国学术与文化重建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对象。

我们说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文化的研究，说中国典籍的外译揭示中国文化的全球性意义，并不是说对象国家完全按照我们的理解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而是说，中国文化通过这些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进入了世界各国文化之中，开启了他们对东方和中国的理解，这些理解和接受已经构成了他们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在不同的时期在各国文化史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它都说明了中国文化作为他者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这种误读尽管变了形，但它们总是和真实的中国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已经融入了各国文化中的这种变了形的中国文化和中国自身再发展已经是两种形态的中国文化。不能用中国自身文化的理解来看待这种变了形的中国文化，反之，也不能从这种变了形的中国文化，作为标准来判断真实发展中的中国文化。在当代的西方文化理论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只是从其批判的方面说明西方的东方文化观的特点和原因，萨义德的理论有其深刻性和批判性。但他不熟悉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理解和接受的全部历史，例如，18世纪的中国热则是从肯定的方面说明中国对欧洲的影响。其实无论是从批判的方

(1) 王宏印：《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6页。

(2) 在非通用语领域也有像林语堂、许渊冲这样的翻译大家，例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的泰语教授邱苏伦，她已经将《大唐西域记》《洛阳伽蓝记》等中国典籍翻译成泰文，并受到泰国读者的欢迎，邱教授也获得了泰国的最高翻译奖。

(3) 很高兴看到中华外译项目今年的语种大大扩展了，莫言获奖后，中国小说的翻译也开始面向了全球招标，这是进步的开始。

面还是从肯定的方面，中国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成为西方文化眼中的变色龙是注定的。这些变化并不能改变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和它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同反映，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不同认知和不同的中国形象，说明中国文化成为塑造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从而彰显出来。

从中国文化史来看，这种远游在外，已经进入世界文化史的中国古代文化并非和中国自身文化完全没有联系，这种被误读和变形了的中国文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与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文化和精神相关联，这样一种文化的纽带一直存在。笔者不认同套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后现代理论下对西方汉学和译本的解释，这种解释完全隔断了被误读和变形的中国文化与真实中国文化之间的精神关系。我们完全不可跟着后现代的殖民主义思潮跑，将这种误读的中国文化看成纯粹的西方人的幻觉，似乎这种中国形象和真实的中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笔者认为，在西方文化中被误读的中国文化和真实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像在云端飞翔的风筝和牵动着它的放风筝者之间的关系。这是一只飞出去的风筝，它随风飘动，但线还在，只是细长的线已经完全无法解释飞翔的风筝上下起舞的原因，因为那是风的作用。完全将风筝的飞翔说成放风筝的人的作用是片面的，但将飞翔的风筝说成它在自由地翱翔也是荒唐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对建立在19世纪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兰克史学理论持一种谨慎的接受态度，同时，对20世纪后现代理论的文化理论更是保持时刻的警觉，因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说明中国和世界之间复杂多变的文化关系，用其任何一面都无法说清世界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影响，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需要用一种新的理论加以说明。

学术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领域。在7年内我们课题组是不可能将这样一个丰富的研究领域做得尽善尽美的。因此，我们在做好导论研究、编年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之外，还做了一些专题性研究，这些专题性研究，以点的突破，以个案的深入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在跨文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在各国不同文化境域的传播与发展，这是

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空间，以昭示未来的研究路径，说明这个研究领域的复杂和丰富的面貌。亟待后来者不断丰富与开拓。

这个课题实际上是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与合作下完成的。意大利罗马智慧大学的马西尼(Federico Masini)教授指导了中国青年学者王苏娜主编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意大利的传播编年》，法国汉学家何碧玉和安诺与中国青年学者刘国敏、张明明一起主编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法国的传播编年》。他们的参与对本项目的完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些汉学家的参与，我作为丛书的主编表示感谢。同时，这本书也是国内学术界老中青学者合作的一个结果，北京大学的严绍盪先生是国内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影响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他带领弟子王广生完成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在日本的传播编年》；福建师范大学的葛桂录教授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参与者，他承担了本项目2卷的写作，分别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和《中国古典文学的英国之旅——英国三大汉学家年谱：翟理斯、韦利、霍克思》，正是由于中外学者的合作，老中青学者的合作，这个项目才得以完成，从而使这套书展现出了中外学术界在这些研究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这个课题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近年来第一个教育部社科司的重大攻关项目，项目的展开得到了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亚非学院、阿拉伯语系、中文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英语学院、法语系、阿拉伯语系等几十位老师参加了这个项目，从而使这个项目在语种的覆盖上多达二十余个。这里的一些研究具有开创性，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在关于亚洲和东欧国家的传播研究，有些在国内是首次展开。开创性的研究也就意味着是一个需要不断完善的研究，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期，会有更为全面深入的文稿出现，本课题作为一个学术的孵化器也就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学术总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成立已经19年了，从一个人的研究所，变成一所大学的重点研究基地，它所取得的进步是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校领导矢志不渝的支持分不开的，也与

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各位同仁的精心合作分不开。一个重大项目的完成，团队的合作是完成项目的关键，在这里我对参与这个项目的所有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项目的完成是所有参加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最后，我以在导论中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论文，以从学术上对漫长的20世纪后中国文化发展做一个初步的展望。

20世纪是动荡的世纪，是历史巨变的世纪，是世界大转机的世纪。

20世纪初美国逐步从英国人手里接下西方资本主义的头把交椅，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纪初的胜利和世纪末苏东体系的崩溃成为20世纪最为重要，并影响20世纪整个进程的重大事件。目前这个世界体系仍是以西方所主导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全球更大的扩张和组织生产，西方的话语权成为其资本与意识形态扩张的重要手段。

20世纪后期中国的崛起无疑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中国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跻身于世界舞台，它也必将以文化大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展示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因此，正像中国的崛起必将改变已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一样，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外译和传播，必将把中国思想和文化带到世界各地，从而从根本上将逐渐改变19世纪以来形成的世界文化格局。

20世纪下半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家整体崛起，西方汉学界加大了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其翻译的品种、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¹⁾，虽然至今我们尚不能将其放在一个学术框架中加以统一的研究与考量，但大势已定，中国文化必将随同中国的整体崛起而日益成为具有更大影响的文化，西方文化独霸世界的格局必将被打破。

世界仍在巨变之中，一切尚未清晰地

展现出它的逻辑，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阿瑞基，他从宏观经济与政治的角度对21世纪的发展做出了略带悲观色彩的预测，他认为在今后世界有三种结局：

第一，旧的中心有可能成功地终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在过去500多年时间里，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是一系列金融扩张。在此过程中，发生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卫士换岗的现象。在当今的金融扩张中，也存在着产生这种结果的倾向。但是，这种倾向被老卫士强大的立国和战争能力抵消了。它们很可能有能力通过武力、计谋或劝说占用积累在新的中心的剩余资本，从而通过组建一个真正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帝国来结束资本主义历史。

第二，老卫士有可能无力终止资本主义历史的进程，东亚资本有可能渐渐占据体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一个制高点。那样的话，资本主义历史将会继续下去，但是情况会跟自建立现代国际制度以来的情况截然不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制高点上的新卫士可能缺少立国和战争能力，在历史上，这种能力始终跟世界经济的市场表层上面的资本主义表层的扩大再生产很有联系。亚当·斯密和布罗代尔认为，一旦失去这种联系，资本主义就不能存活。如果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历史不会像第一种结果那样由于某个机构的有意识行动而被迫终止，而会由于世界市场形成过程中的无意识结果而自动终止。资本主义（那个“反市场”[anti-market]）会跟发迹于当代的国家权力一起消亡，市场经济的底层会回到某种无政府主义状态。

最后，用熊彼特的话来说，人类在地狱般的（或天堂般的）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帝国或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社会里窒息（或享福）前，很可能会在伴随冷战世界秩序的瓦解而出现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恐怖（或荣光）中化为灰烬。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1) 李国庆：《美国对中国古典及当代作品翻译概述》，载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126-141页；张海默：《北美中国絮儿：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张西平、李雪涛、马汉茂等：《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

资本主义历史也会自动终止，不过是以永远回到体系混乱状态的方式来实现的。600 年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就从这里开始，并且随着每次过渡而在越来越大的范围里获得新生。这将意味着什么？仅仅是资本主义历史的结束？还是整个人类历史的结束？我们无法说得清楚。⁽¹⁾

就此而言，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从根本上

是与中国崛起后的世界秩序重塑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与中国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衰文化衰，国强文化强，千古恒理。20 世纪的历史已经结束，21 世纪刚刚开始，一切尚在进程之中。我们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我们期盼一个以中国文化为底蕴的东方大国全面的崛起，为多元的世界文化贡献出她的智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书讯】

[意]卫匡国著,[意]白佐良、白桦译:《中国文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中国文法》是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所著,由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和旅意华裔学者白桦翻译。卫匡国所著《中国文法》被研究界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文语法著作。《中国文法》共分三章,首章谈语音,后两章论语法,是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是西方人学习汉语文法最早的工具书。

著者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1614—1661),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功绩,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及科学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在欧洲游历期间,用拉丁文撰写了四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文化的著作,分别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论鞑靼之战》和《中国文法》。

(1) 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4—435页。